



南 宫 碑 今 昔

李春雷
高影新

道光三年(1823年),张裕钊出生于湖北鄂州的一个书香世家。

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裕钊入京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主试官正是曾国藩。张裕钊中选之后,官授内閣中书。后来,张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被合称为“曾门四学士”。

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却无意于官场升迁,自言“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嗜好,自幼酷喜文事”。后弃官南归,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张裕钊以文名世,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追随曾国藩时,与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的李鸿章成为至交,时人称其二人曾为曾国藩的文武两臂。

张裕钊的书法精于八法,由魏、晋、六朝上窥汉隶,“临池之勤,未尝一日辍”。康有为曾说“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更是在《广艺舟双楫》中多处提到了张裕钊,赞誉张裕钊的书法“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并且康有为本人也研习张裕钊书体,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的书名,就是此书题写的。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五月的一天,保定莲池书院池塘中的莲叶亭亭如盖,在水面上随风摇曳。

时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兼学古堂教授的张裕钊收到一封书信,南官绅士宋弼臣应南官县令李傅棣的委托,通过张裕钊旧友李梅生,邀请他为《重修南官县志》碑撰文并书丹。

张裕钊得知为县学命笔,便欣然应允。多年教学的经历,让他对教育非常重视。为了让文稿更加严谨,他专门致信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大学士吴汝纶,请他斧正。碑文完成后,他再次致信吴汝纶,言及:“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官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可见他本人对这通碑文也是非常满意的。

“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这是张裕钊发自肺腑的呼唤,在青石之上如春雷。650字碑文立论鲜明,结构严谨,文辞犀利,言简意赅,既有对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的呐喊,也有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希望国家“志气所动,人随而兴”的期盼。碑文字体独具一格,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犹如刀劈铁铸,劲拔雄奇,取魏碑之势,化篆之圆、隶之方为一炉,方中带圆、圆中见方,气骨兼备。

这一年,张裕钊64岁,书法技艺已炉火纯青。他的字,笔势劲健,内藏筋骨,柔峻相间,融而化之,时人赞誉“别开生面,独创一格”“文字双美,刻镌兼优”,并名之为“南官碑”体。

张裕钊弟子众多,有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张謇,有名噪一时的古文家袁溥、马其昶和书法家王洪钧等。日本的宫岛咏士(又称宫岛大八),将南官碑体书法带到日本,创建善邻书院,成为日本书法的一大流派。

南官碑体书法在清末民国时期已成为通用的楷书字体,孙中山先生用南官碑体题写“饮和食德”“同德书报社”等,沈曾植、郑孝胥等书法大家都曾痴迷临写南官碑体。

清末民初,曾被称为“河朔重镇”“北门锁钥”的古城大名,虽然已现颓态,但依然是冀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0年,张裕钊的入室弟子王洪钧正式定居大名,在此开坛授徒。

王洪钧,字锡三,祖籍湖北,后迁至天津。王家世代经营盐业,是当时“天津盐业八大家”之一。王洪钧早年也曾短暂入仕,担任过县令。但最终,他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在翰墨烟云中,铭刻在了“南官碑”之上。

王洪钧曾就读保定莲池书院,成为张裕钊的入室弟子。彼时王洪钧15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对同为鄂籍的恩师张裕钊由仰慕到追随,倾心研习。有人评价他:于书法颇有功力,尤其所习南官碑深得张的笔法,极受张裕钊的赏识;张裕钊去西安后,王洪钧仍潜心研习南官碑书法,渐达佳境。后人追溯现存王洪钧最早墨迹,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于《张猛龙碑拓》册页上的题签,从中可窥得其书墨之风颇具张裕钊之神髓。

王洪钧深得张裕钊“南官碑体”神韵,碑帖兼美融合,不拘一格,“集众芳于一身”,雄浑兼韵,清润秀逸,流利洒脱。王洪钧在同时代的书家中出类拔萃,人书俱老,在民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王洪钧门徒甚众,受教于他门下而颇有所成者有卢相之、李鹤亭、齐仰绍、王鸣岗等人,其中尤以李鹤亭成就斐然。

李鹤亭,名松年,字鹤亭,自幼聪颖善学,诗、书、画、印皆有专精。他师从王洪钧“南官碑体”书法一脉,笔法风流蕴藉,于字势的起承承接之间,气脉贯通,

古城邯郸,丛台之上,流传着一段三代书法家题书丛台的传奇故事。

20世纪60年代初,邯郸市重修丛台,南官碑第三代书家李鹤亭应邀为丛台题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丛台公园,围着丛台绕行。七天之后,铺纸泼墨,一挥而就“武灵丛台”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丛台胜迹亭内还有他根据“二度梅”故事题写的“夫妻南北,兄妹沾襟”八个大字。这些墨宝,宛若丛台的眼睛。

1989年,李鹤亭之子李守诚应邀题写“丛台简介”碑文。其时,正值李守诚书法创作的高峰期,邯郸名胜古迹的匾额及邯郸市企事业单位的牌匾多出于其手。为了充分展示汉字之美,避免刻字时失真,李守诚经常直接把字写在碑面上。“丛台简介”碑立碑之时,诸多书家蜂拥观摩,称其碑迹“风韵可与唐人比肩”。几十年来,各地书法爱好者拓片拍照,以为摹本。

2022年,丛台公园南门新建景观墙,李鹤亭之孙李喜泰应邀题写。他精心题写的白居易诗《邯郸冬至夜思家》,成为丛台公园的又一处景致。

跨越一甲子,祖孙三代书法家,在同一处历史文化景观题书刻碑,堪称书坛传奇和佳话。

他们的书法,在邯郸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南官碑!

南官碑书法为清代书坛泰斗、古文大家、教育家张裕钊所创,因他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官县志》而得名。以碑之名来命名书体,中国书法史上独此一脉。

南官碑体书法作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唯一的书法类代表,其影响,在全国;其中心,在冀南;其核心,在书家。



1990年9月,李守诚站在他为北京亚运会书写的“北京欢迎您”前。 李喜泰摄

连绵不绝,洒脱清逸之间又不至于雄浑朴厚,初步形成了独具韵味和内涵的新的“南官碑体”风格特征,后世谓之“李氏南官碑”。

李鹤亭是李氏南官碑体形成的发轫者。他将诸体融于南官碑体之中,变该书体“骨多于筋”而为“筋多于骨”,使南官碑体字的线条、颜色等更和谐,尤其是擎掌大字,“藏锋以含其气,无锋以含其味”,行笔凝重质厚,气象雍裕。

李鹤亭写字讲究一气呵成,唯有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的烈士题写墓碑时,出现了例外。20世纪50年代初,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请李鹤亭题写六块烈士墓碑。听说是为烈士题写墓碑,李鹤亭庄重地铺开纸笔,一心想写好,可是他读完烈士事迹,禁不住热泪长流,一提毛笔手就颤抖不已,一连写了十多遍,才算完成。后来他专门写了一首诗:“烈士为民流血,我为烈士流泪。手握毛笔打战,写罢墓碑心碎。”许多人看了李鹤亭题写的墓碑都说:“带着感情写字,字字写得有情。”

20世纪中期李鹤亭定居邯郸,在城北以刻印、代写书信为生。1956年加入邯郸刻字合作社,积极投入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尽管当时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硬笔书写的普及,毛笔书写式微,写毛笔书法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李鹤亭始终坚守着普及推广南官碑体书法艺术的志愿,促其在冀南一带流行,使其影响更加广泛,为邯郸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鹤亭传授的弟子有李守诚、王乐同、胡桂林、赵锡友、梁泽、李守文、李志安等。其中有突出成就者为其子李守诚。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北京长安街一幅大型壁画上,由李守诚书写的“北京欢迎您”五个雄浑大字,向世界展示着南官碑体书法之美。不时有国外的书法家因为这几个字,几经周折找到邯郸。还有人表示,看过李守诚的《回车巷碑记》拓片后,对他的南官碑体书法更是仰慕、向往。

古城邯郸绵延三千年城市史,尽管城池多次更迭、覆灭,但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中轴线始终没变,就位于现在的城内中街“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位置。

1981年,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迹,邯郸市政府拨出专款,在回车巷当年筑刻“藺相如回车巷”的石碑原址上建石柱石碑亭。

碑刻《回车巷碑记》,由汤振宇撰文,李守诚书丹。书文俱美,一经问世,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李守诚兼容百家,自成一派,书法技艺炉火纯青,日臻化境,显现出了文化底蕴厚重和时代美感强烈的李氏南官碑体个人风格。《回车巷碑记》被众书家奉为李氏南官碑体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在书史上的地位。他的成就不仅令书坛瞩目,也引得国内众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纷纷前来观摩学习,众多书法爱好者竞相研习、传拓,在邯郸以及周边地区掀起了研习南官碑体书法的热潮。《人民日报》还以“别开生面南官碑”为题,对李守诚的书法艺术进行了报道。

李守诚出生于1924年,是南官碑体书法的第四代书家。自幼跟随父亲潜心研究书法,“熔铸南北,不主一家,师于万物,回归自然”,在突破创新中孜孜以求,不懈努力。他擅父之传所创的李氏南官碑体,气象雄深,浑涵飘逸,把历经两个世纪流传不绝的“南官碑体”这一书法流派推向了新的境界。

李氏南官碑体,突破了南官碑体内敛的笔法、刚健硬朗的书风,强调阴阳协调、贵和尚中,在刚与柔、圆与方之间调和平衡,刚柔相济、会于中和。抑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体现了端庄雄伟、恢宏宽博的新的美学价值。

从艺术特点来看,李氏南官碑体筋骨气厚,线条雄强深厚,流动行进中富于变化,如顿挫行进。再加上飞白穿插,线条更加丰厚饱满,浮雕感很强。字形结体弧形拱出,凝重外张,浑厚与雍容相协,气宇轩昂颇具庙堂气象。在墨法运用上更加灵动,汲取了历史上的多种墨法,虚实相应、吐纳自然。布局则大小穿插,连带自然,从容舒缓……

书家重人品。李守诚的为人处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明善守诚、襟怀坦荡、性情淡泊。他常说,历史上有许多人品高尚的书法家,新时代的书法家更应重人品,否则虽有书艺,

而立身一败,必为世人所耻。李守诚桃李满园,弟子众多。李喜泰、封俊虎、闫世勤、尹朝群等,皆颇有建树,其中成就斐然,为南官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者,首推其子李喜泰。

青砖黛瓦,古槐长巷,一行别开新境的南官碑体“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在回车巷口的和氏璧雕塑下熠熠生辉,题写者正是李喜泰。

2021年,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竣工。南官碑体书法第五代书家、邯郸市南官碑书法协会主席李喜泰应邀题写了街区名称。

李喜泰出生于1963年1月1日,他家学渊源,5岁临池,半个多世纪以来墨耕不辍。他的书法艺术在父亲的成就基础上,又有了更多的突破——气势恢宏而又迂回婉转,端严大气而又洒脱奔放,远绍南周、中取晋唐、近采明清,兼蓄百家之长而自带风神,大胆拓新而又严谨庄重。加上他古文底蕴深厚,饱读诗书典籍,儒雅博学的的气质融会贯通到书法作品里,更有韵味与内涵。

李喜泰的匾额书写,兼美历代名家,既有翁同龢的雄浑厚重,又有赵之谦的典雅和书卷气。更为难得的是,“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是在一幅六尺整张宣纸上一气呵成,这一年他58岁,与父亲57岁题写《回车巷碑记》时一样,正值书法名家“60岁左右”的艺术创新突破黄金时期。

李喜泰很静,讷于言,然“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于诗、史、经、禅、道等广为涉猎,尤善古体诗词、楹联歌赋。“秋水潺湲乱石幽,空山惟有数人游,倚崖遥指仙桥渡,路转峰回已上舟。”广博深厚的国学精粹滋养,浸润在书法当中,渐成开章布局的筋骨、行锋运笔的气韵,着墨落毫的意境,令其作品开合中有蛟龙惊鸿之势,俯仰间尽豁达通透之悟。展书于前,墨香萦绕,古意与今韵相互交融,一缕令人醍醐灌顶的灵光透纸而出。

清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有人形容李喜泰书法,犹如深山赏竹般有绿影森翠、清风入耳之感;又如古井微澜,于古朴厚重的宁谧氛围里,凸显灵动、随性之气。如若仔细品读,不难发现其作品字里行间或飘散出机锋禅意、物我皆空之感;或若身处寒江独钓,一派清静寂寂,从中看出的是敦儒清秀的文人风骨和淡淡书香墨韵。

李喜泰作书、作诗、作文,始终围绕着书法实践,从不构筑空中楼阁。他说南官碑体在邯郸的发展已经历了七代,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是南官碑体的连续性;南官碑体在邯郸创造了新的文化存在——李氏南官碑,表现了南官碑体的创新性;南官碑体在邯郸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了内圆外方的特点,这是它的统一性;南官碑体一直坚持融合百家,不断汲取新的文化营养,这是南官碑体的包容性;南官碑体书法始终重视历代优秀书法的长处,从不孤芳自赏,体现了和平性。

1990年,湖北省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李喜泰与日本书法家鱼住和晃同时入选第一届理事。鱼住和晃是日本南官碑体(张裕钊体)书法传人,张裕钊入室弟子宫岛咏士的入室弟子上条信山的弟子。两位书法家相见时激动不已。李喜泰赠书“文而不华”,鱼住先生欣喜称之为“大礼”。2023年10月18日,在张裕钊先生故里湖北省鄂州市,举行了纪念张裕钊先生诞辰200周年文化艺术活动,在活动现场,李喜泰再次见到鱼住和晃,二人相谈甚欢。

南官碑体书法不仅在中华大地蔓蔓日茂、芝成灵华,同时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形成了蔚为繁茂的南官碑体书法艺术之林。

李喜泰不仅在书法技艺上孜孜以求、负重前行,在南官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2010年12月,邯郸市南官碑书法协会成立,李喜泰当选为协会主席。这是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南官碑体书法流派协会,在李喜泰的带领下,学习南官碑体书法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越来越广泛。

他始终把张裕钊先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教诲奉为南官碑体发展的信条,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书法人才,并且坚持送书法进校园,为“南官碑”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千年以来无与比,百代而往有相承。”南官碑体书法是新时代中华文明的优质载体,以历史观照书法,以笔墨书写时代,不以山海为远,不以日月为限。南官碑,从历史深处走来,必将向着更辉煌的时代走去……

答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题”

刘采萍

日前,京津冀三地多家单位联合完成的《京津冀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正式发布。该图展示了京津冀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系京津冀三地首次基于统一空间框架对历史文化资源作系统梳理、客观展示和权威发布。(2月28日新华社报道)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从过去来看,三地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本就是交融互促、共生共荣的关系;从未来而言,社会发展的要目的之一就是传承文化、赓续文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然应该包括文化协同这一重要内容。在擘画蓝图共谋发展的时代课题之下,我们如何让“协同发展”这张试卷上的“文化题”拿到高分呢?

与经济发展可以列举大量数字化的指标作为发展的向导不同,文化具有呈现形式纷繁和演化进程曲折等特点。笔者以为,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寻找发力点。

首先,答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题”,要有一盘棋意识。

以前述发布的《京津冀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为例,就是用一张图、一盘棋的思考角度,重新考量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截至2023年,我国57项世界遗产中,京津冀地区占8项,其中包括长城、大运河等能够与其他地区历史文化形成线性连接的重要文化资源;区域内还有8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3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务院已公布的八批共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京津冀地区共有474处……

拓展对于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在时间纵深度与地域广度上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在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版图图上,找到坐标更清晰、特点更鲜明的位置,从而夯实传承保护和文化建设的基础。

其次,答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题”,当以“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衡量标准。

2月26日,一家特殊的图书馆在雄安新区举行了揭牌仪式。这家馆命名为“XIN空间”的社区公益图书馆,是由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与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共同创建的。合作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合力打造了这一新型阅读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旨在以创新理念科学配置文化资源,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这样的尝试越多,京津冀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的协同发展目标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再次,答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题”,不妨以人才、知识的交流合作为行动抓手。

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难以一蹴而就。但是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人才,却是一种流动便利的因素。“借力”思维引入协同发展实践,更能发挥促进新型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2023年12月10日,由京津冀三地八家单位合作共建的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成立。这显然是利用了北京、天津名校云集、研究力量雄厚的人才优势,配合三地文化交融、历史深厚等资源特色,践行“大考古”理念,推动京津冀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

山水相依,文化一脉——京津冀地区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传承这样的文化基因,构建新的共同记忆,我们有太多课题亟待破解。而行动的起点,首要的便是达成共识——只有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京津冀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引领民众参与行动,区域协同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根本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